

纪念我的父亲王孝良

■ 王颖先

今年是我毕业三十周年，也是我父亲曾担任过班主任的计41班同学毕业三十周年。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三十一载，但我对他的怀念却与日俱增。仅以此文作为纪念。

求学

父亲出生在河南省通许县一个贫困村庄里的农民家庭。我的爷爷奶奶都务农，爷爷同时在当地小学当校长。父亲有许多兄弟姐妹，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大哥很早就结婚分家了，家里失去了一个主要劳动力，生活更加窘迫。从二伯往下的弟妹们面临的是失学、种地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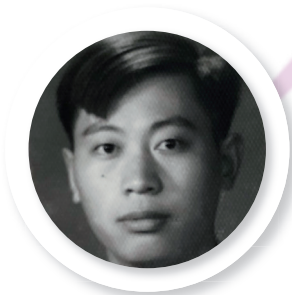
父亲曾说，他小学时学习成绩并不好，但二伯毅然决定自己留在家中务农，用勤劳和智慧为弟妹们挣下更光明的未来。二伯每隔几个月就推着粮食到开封去卖，换钱为父亲交学费和生活费。一次，二伯送粮晚了几天，父亲手上的钱几乎花光。二伯问他那几天吃了什么，回答是每天用几分钱买一碗胡辣汤。二伯每回忆起此事，神情中都充满了对弟弟的怜惜。后来父亲住到我奶奶的表妹家，这位亲戚家开面粉厂，父亲靠辅导小表弟功课换取食宿，才不再饿肚子了。

二伯的远见和付出，使父亲得以在开封读完

高中。高中毕业后，父亲考取了广州华南理工学院机械专业。他是通许县多年所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大学毕业不久，由于学习成绩出色，父亲被选入中科院的一个集训班。集训班的目的是培养中国未来的计算机专家。之后，父亲又以优异成绩被国家选送到苏联莫斯科郊外的切布诺核子研究所继续深造。

苏联

父亲曾很怀念地说起他和苏联同事之间建立的友谊。苏联同事们亲切地管他叫Ciao，因为这个字与他的名字发音相似。



求学时期的父亲



父亲与同事们在苏联

父亲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六年，直到中苏关系破裂，他于1965年回国并加入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这是电子系及后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前身。父亲像所有有志之士一样，准备在清华大展宏图、报效祖国。

清华

风华正茂的父亲这次没有那么幸运了，他赶上了那个疯狂的年代。到清华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父亲所在的系后来被下放到工厂接受工人再教育。从工厂回到清华，他开始接受工农兵学员再教育。父亲当上了班主任，他班上一位学员得了乙型肝炎，因为这名学员是被改造的对象，无法隔离，父亲亲自去医院照顾他。结果父亲也染上了乙肝。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父亲的命运在他被传染上乙肝病毒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乙肝病毒是已知的少数几种可以引起基因突变并导致癌症的病毒之一。乙型肝炎是一种很摧残人的疾病，它使人长期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中。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每次下班回家都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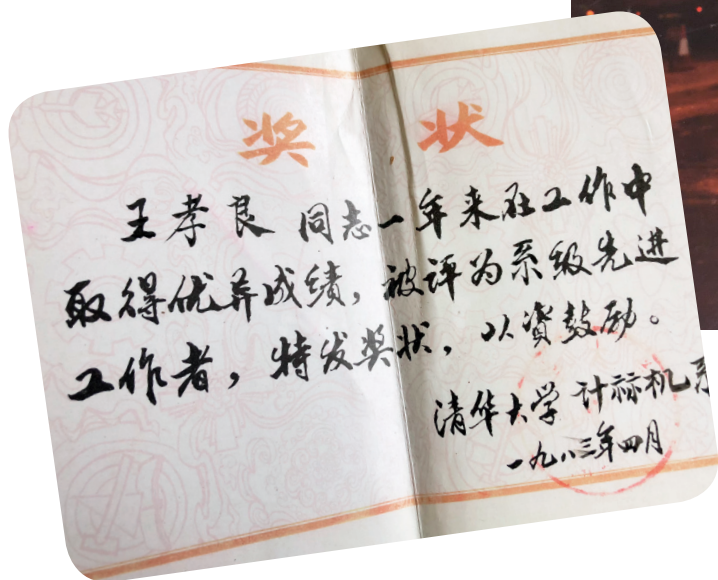
父亲在清华园

母亲承担了几乎所有家务。家里总是有个药锅在煎药，父亲看过许多医生，尝试过各种偏方。他顽强又痛苦地与疾病抗争了15年，最终还是因肝癌去世在1988年的除夕。

就在动荡的年代里，父母和同事们还是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父亲参与设计和研制了中国第一个批量生产的小型计算机DJS-130。母亲当时在清华机械厂做工程师，与精仪系的老师们一起研制数控机床。她曾在北京展览馆为周恩来总理展示数控机床刻制的熊猫和竹子。

这里有一份在母亲那里找到的，没有注明日期的父亲的工作报告（很可能是80年代初），父亲当年所做的工作从中可见一斑：

- 1958年从华南工学院毕业。
- 1959年参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119计算机的机械部分设计。
- 1960年至1965年间，在苏联学习计算机技术，同时与苏联专家一起调试和维护了两台电子计算机Kueb和M-20。
- 加入清华大学之后
 - 参与小型外转子磁鼓的研制。此项任务由计算机外部设备教研组，四机部15所，校电工厂等协作。文化大革命前做出两台样品。
 - 102辟锥测量机的输入部分。
 - 创办721工人大学。在此间参与编写了计算机原理（运控部分）和交换器讲义。讲过交换器和计算机原理一部分课。与几个教师一起写了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参考资料。
 - 参加了152中型组件计算机交换器部分的设计。
 - 参加了四机部中系列机DJS-130（原DJS-100）计算机的联合设计。当时，清华参与领导和设计的老师有房家国、



林定基等人。此机在全国批量生产。

- 编写国外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概况。

1980年以后

- 继续在计算机系统和结构教研组做研究。
- 多次去山东潍坊出差，协调计算机存储设备的生产。
- 1983年左右和同事一起去香港接机并接受现代计算机操作培训。
- 在国内很多计算机科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计算机存储设计、计算机与办公自动化方面的文章。
- 担任计41班主任

1987年，父亲离开计算机系，加入清华大学出版社，成为计算机技术领域方面的主编。

做人

对于父亲，我真正的理解是在与他分别以后。

父亲是一个有情趣的人，他喜欢摆弄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个巨大的收音机。那里面有许多真空管，隔一段时间会有个真空管坏掉，他总是自己修。收音机上方有一个暗室，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唱片转盘。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古典音乐唱片大多在“文革”中被毁掉了，保留下来的有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和圣桑的《天鹅》。每当父亲打开唱片转盘，我就在音乐中想像自己超越时空到了俄罗斯。他也喜欢用焊枪和半导体器件组装收音机。父亲还非常钟爱摄影，他从俄罗斯买回至少3架高级35mm相机，有横式也有竖式，还有一套放大和洗像器材。他喜欢带着我，用这套器材把35mm胶片放大、显影、定影，最后晾干。后来，父亲看到他的一个侄子也喜欢摄影，便把其中两架相机送给了他，鼓励他追求兴趣。

父亲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是学习语言。他

俄语一直很好，而且很早就开始自学英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上小学时见他在读一本英文《毛选》。父亲经常看英文书籍，也跟着广播或电视学习英语。后来他的英语水平相当不错。

父亲对家乡充满眷恋，时常回老家探亲，并带上我和弟弟。农村的确很落后，但那里的人纯朴热情，对我们一家尤其好，把父亲视作他们的骄傲。每次去我都想，今后有机会要教那里的孩子们学点儿什么。

我的二伯、他的孩子们，以及我的姑姑们都非常爱戴和崇拜我父亲。父亲开始工作后，经常给二伯寄钱。他说要供二伯所有的孩子们上学，并且说到做到。二伯的孩子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上了老师或是会计。父亲从苏联回国时给我堂姐买了一双红皮鞋，当时她周围没有任何人穿过皮鞋。2016年，我和儿子参加了我外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毕业典礼，他妈妈就是得到红皮鞋的我的堂姐。一双红皮鞋，一个美好的愿望，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可以看到从我二伯到我父亲，到我堂姐，到我外甥的一条清晰脉络。我想父亲会非常骄傲的。

父亲非常关心爱护他的学生们。在毕业30周年之际，计41班的同学们还能清晰地回忆起父亲当年做班主任时的点点滴滴。父亲关心家庭遇到不幸、生活困难的学生；帮学生化解矛盾；在学术上更是创造条件，安排学生们去系里参与了解科研活动；组织兴趣小组，使学生们更早接触专业知识，了解科技前沿。他们的分享让我看到了父亲为人师表的一面。

从父亲那里，我和弟弟学到许多做人的品质：勤俭、努力、专注和坚持。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感恩，对处于困境的人给予同情与帮助。

父亲去世后，清华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立即

帮助我家安排后事，并尽量帮我们解决经济困难。外语系党委书记李仙根教授在第一时间帮我申请了助学金，我弟弟所在的机械工程系也帮他申请了贷款，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我在清华读的是外语专业，大二以后开始选学计算机系的课程。虽然我从未告诉教授们我的父亲是谁，他原来的同事们还是默默地在学业上帮助我。教操作系统的苏云青老师、教汇编语言的沈美明老师、教数理逻辑的王家厥老师、教图论的戴一奇老师都对我关爱有加，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顺利拿到了计算机和外语的双学位。

传承

父亲很重视对我和弟弟兴趣的培养。他曾带我们参观现代化机房，还坐在屏幕前亲自教弟弟BASIC语言。

父亲对我和弟弟的教育都比较开放，他从未要求我们必须学什么科目。我上大学时选学了科技英语，弟弟学了机械工程。受他多年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俩都不约而同地转向跟计算机有关的学科。我读了计算机系的双学位，弟弟从大二开始帮助力学系老师编写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后又与中科院合作，用单片机做卫星数据采集。

作为清华计算机系创始团队的一员，父亲对自己专业领域有很深的理解和远大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计算机还被大家看作阳春白雪，只在实验室里作为被研究的对象时，他已经看到计算机在工业及人类生活方面的应用潜力，研究相关的前瞻性领域，并发表过《计算机与办公自动化》的文章。

有时我想，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看到今天计算机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发展，会有何感想？

（作者为1985级外语系校友）